

北大中文文库

王力文选

中国语言学是有光荣的传统的，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很好的语言学理论，实在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立足汉语，弘扬传统，融会古今中外，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王力 著 / 《王力文选》编辑组 编选



王力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中文文库

王力文选

王力 著 / 《王力文选》编辑组 编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力文选/王力著;《王力文选》编辑组编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0

(北大中文文库)

ISBN 978-7-301-17819-5

I. ①王… II. ①王…②王…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6658 号

书 名: 王力文选

著作责任者: 王 力 著 《王力文选》编辑组 编选

责任编辑: 旷书文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819-5/H·26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334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25 印张 32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

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却永

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陈平原

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前 言

一、语法部分

王力先生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潜心于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中国现代语法的建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语法方面有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有许多研究成果影响深远。

本书语法部分共选入四篇论文,基本上是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是1937年发表在《清华学报》(12卷1期)上的一篇学术论文。这篇长达四万余字的论文开启了对汉语语法专题进行历时研究的先河,“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系词”这一术语就是此篇文章首先提出的,该文确认的系词有“为”、“是”、“非”等。文章指出先秦汉语的肯定判断句不用系词是最常见的事实,系词“是”是六朝时代由表复指的指示代词演变而来。^②为了“彻底考求”“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在历史上的演变”历程,文章搜求出“为”、“是”、“非”等于古文中可能作为系词用法的大量用例,并按出现的各种句型逐一考察它们的具体使用情况,对系词的来源、产生及发展做了详尽的论述。王力先生在讨论系词从无到有的历史演变时,非常重视语法的系统性。“所谓文法者,本是语句构造上的通例;如果我们在某一时代的语料中,只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语句构造方式,那么就不能认为通例,同时也就不能成为那时代的文法。即使不是传写上的错误,也只能认为偶然的事实罢了。”“乙时代所有的文法,甲时代未必就有。”可见,王先生始终都是在整个汉语语法系统中来考察系词的产生这一问题,从不根据“单文孤证”来立论,“严守着‘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系词的产生时代已经被上推到了秦汉时期。但诚如宋绍年

① 宋绍年2002《王力先生与汉语语法研究》《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② 关于系词的范围和产生时代,王力先生后来在《汉语史稿》里作了修正,认为“就汉语来说,真正的系词只有一个‘是’字”、“汉语真正系词的产生,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

(2002)先生所言：“尽管系词产生的时代提前了几个世纪，但是文章的开创意义及其在方法论上的示范作用却是永恒的。”

汉语的词类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中非常棘手的难题，自《马氏文通》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在于词类划分的标准。汉语里的实词能不能分类？如何分类即分类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王力先生早期基本是主张单凭意义标准分类的，他说：“至于中国的词呢，它们完全没有词类标记，正好让咱们纯然从概念的范畴上分类，不受形式的拘束。”^①经过五十年代关于词类问题的大讨论，人们发现如果单凭词义标准，而汉语里一词多义现象非常常见，兼类过多势必导致词无定类，甚至有学者据此得出汉语实词无词类的结论。这里收录的论文《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在这篇文章里，王力先生公开修正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该文明确指出“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单纯地从概念范畴去分别词类是错误的”，并分别从词义、形态和句法同词类的关系方面论证了汉语确有词类且词有定类这一观点。文章有理有据，有力地反驳了汉语实词无词类的看法。那么，如何划分才能做到词有定类？即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汉语实词的分类》一文着力要回答的问题。王力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做了自我批评：“我在解放前在词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就是单纯从意义范畴去区别实词的分类，没有把句法功能与词类问题结合起来。”他明确主张汉语词类划分应“以词汇语法范畴作为标准，具体说来，就是词义标准、形态标准和句法标准三结合”。后来王先生还进一步明确：“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所以当意义和功能有矛盾时，仍当以功能为准。”^②这种观点到今天仍是学界的主流看法，足见其影响之深远。从单一的意义标准向语法功能和意义相结合的综合标准转化，可以看出王力先生对词类本质的思考与认识的发展。

王力先生非常重视汉语自身的语法特点。他说：“研究汉语的语法，必须重视汉语的特点。”^③“我们对于某一族语的文法的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诸语

① 王力 1944 年《中国语法理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② 王力 1957 年《词类》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③ 王力 1944 年《中国语法理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族相异之点。”^①1956年发表的《主语的定義及其在漢語中的應用》和《語法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都是結合漢語自身情況談語法特點的。《主語的定義及其在漢語中的應用》立足于漢語的實際特點談如何界定漢語的主語，指出“陳述的對象”這個最普通的主語定義由於“漢語名詞沒有‘格’，動詞沒有‘身、數、態’……在辨別主語的實踐上會遭遇許多困難”；“主語是陳述的出發點”這一古老的定義“對漢語來說”，“容易引起曲解，使人們專從詞序上看問題”。漢語里主語和話題的關係，也是學術界長期糾纏不清的問題。文章指出：“把主語看做題目或話題，那是不對的。”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團。”“這裡不賣票。”主張主語是話題的人認為句首名詞性成分“台上”、“這裡”應該是話題，自然也是主語。而王力先生認為主語不應與句首的名詞詞組或句子的主題等同，認為“台上坐着主席團”主語應是“主席團”，“這裡不賣票”則為無主句。所以，王力先生說：“如果拿話題作為主語的定義，只要句首的詞是名詞，就非承認它是主語不可，我很懷疑該不該這樣機械地分析句子。”文章借鑒俄語語法著作對主語的定義，認為對形態不豐富的漢語來說，其主語可以這樣描述：“在敘述句里，謂詞所表示的行為是屬於主語的”、“描寫句里，謂詞所表示的性質是屬於主語的”、“判斷句里，謂詞表示主語所指稱的事物的屬性”。漢語語法研究中，如何定義主語？主語和話題又如何區別？這些問題都還值得繼續探討。《語法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從宏觀上談“語法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文章認為，“語法是語言的本質特徵之一，具體語言的語法自然也有它的特殊的內部發展規律”，“語法構造既然是語言的本質特徵之一，自然也就是構成民族特徵的主要因素”，“各種語言的語法之所以有它的特点，正是歷史條件所形成的”，“就語法的研究來說，時間就是所研究的語言的時代特點，地點就是所研究的語言的民族特點，條件就是所研究的語言所受的社会发展的影响。”這些觀點都是很正確的。文章對當時的語法研究提出三點意見，可以概括為：要區別本質特點和非本質特點、要充分占有材料、要立足于漢語的基礎。這些意見對今天的語法研究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關於漢語詞族的研究，王力先生也開拓出新領域。六十年代發表的《古漢語自動詞和使動詞的配對》指出：“在古代漢語構詞法上有一種特殊現象，就是自動詞和使動詞的配對。”“配對的自動詞和使動詞，二者的語

① 王力 1936 年《中國文法學初探》《清華學報》11 卷 1 期

音形式非常近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文章列出三十七对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情况,得出初步结论:“使动词以去声为主”、“自动词一般读浊母,使动词一般读清母”、“韵部必须相同或相近”。文章首次系统地探讨了古汉语中运用改变声母、韵母或者声调来构成新词这种特殊的构词法,为进一步深入认识和研究汉语词族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第一次提出汉语的滋生词问题。认为“汉语滋生词与欧洲语言的滋生词不同”,明确指出汉语滋生词的特点:“汉语滋生词不可能是原始词加后缀,只能在音节本身发生变化,或者仅仅在声调上发生变化,甚至只在字形上不同。”文章还具体分析了“转音的滋生词”、“同音不同调的滋生词”和“同音不同字的滋生词”,并提供了原始词和滋生词的大量例证,是研究古汉语构词法的重要参考资料。

八十年代发表的《“之”、“其”构成的名词性词组》以详实的材料分析了由“之”、“其”构成的名词性词组。文章指出:“主谓结构插进了‘之’字,成为名词性词组,它可以用作主语、判断语、宾语(包括介词后的宾语),或关系语。”并明确过去那种“认为这种结构是句子的伪语化”以及“取消句子独立性”的提法“不切合实际情况”。“这种语法结构是本来就有的,不是‘化’出来的,更不是为了取消句子独立性,才使用这种语法结构。”“‘其’字的意义,等于‘名词+之’”、“在上古汉语里,它永远处于领位。”“把这类‘其’误认为主语,是以今语法说明古语法的一种方法上的错误。”观察之细致让人称赞。文章最后指出:“不但依照外国语法的框框来讲中国语法是错误的,而且依照现代语法的框框来讲古代语法也是错误的。”

上述几篇文章发表的时代分别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王力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部分研究成果,凝聚了王力先生半生的心血。通过阅读这些学术经典,我们不仅可以窥知先生的学术思想形成历程,而且对于深刻理解当代语法思想以及发展或推进当代语法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二、音韵部分

汉语语音史是王力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他在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的研究中都有重要建树,而在上古音的研究成就最为显著,先后撰写了多种著作和论文。从三十年代提出脂微分部说,到八十年代重新构拟上古音系统,他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古音学说和古音体系,在

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古音学说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收入的几篇音韵学的文章，均为他在上古音领域研究的代表作。

提出脂微分部，完成了上古韵部系统的划分工作，是王力先生的卓越贡献之一。发表于1937年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一文，阐述了他关于脂微分部的研究结果。王先生根据章炳麟的队部和黄侃的没部相互出入的情况，断定“佳雷”诸声符的字有独立性，可以另立一部。另外，他在研究南北朝诗人用韵时，也发现脂微分部的线索。再考察《诗经》用韵，确定江有诰等人的脂部应当分为两部。其中《广韵》的齐韵字“黎迷奚体济稽替妻继弟犀启棣”等属脂部，《广韵》的微灰哈三韵字如“衣依希几岂微威韦尾鬼归徽非飞肥”“虺摧回傀雷嵬敦”“哀开凯”等属微部；《广韵》脂皆二韵的字，开口呼属脂部，如“皆司迟示私二伊比尸饥利师夷脂资”等，合口呼属微部，如“淮惟岿怀遗毁坏迫悲哀睢”等。统计《诗经》用韵的结果是，在一百一十例里边，可以认为脂微分用者84例，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可以认为脂微合韵者26例，不及总数的四分之一。再从段玉裁的《群经韵分十七部表》看，34个例子当中，可以认为脂微分用者27个，约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可以认为脂微合韵者7个，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分用的趋势非常明显，分为两个韵部不成问题。之所以有较多的合用例，是因为它们的音值非常接近。

脂微分部说提出以后，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从而使清代以来的古韵部划分臻于完善。在这一点上，王力先生“考古”的贡献并列于清代以来顾炎武、江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等古音学大家之列。

清代的古音学家在对待上古入声韵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处理方式。王力先生把清代古音学家分成“考古派”和“审音派”，考古派把入声韵归入阴声韵（个别归阳声韵），特别是收-k韵尾的入声韵都归入阴声韵；审音派把入声韵部独立。王先生早年是考古派，定古韵为23部。中年以后注重古音研究的系统性，于是改从审音派，将入声独立，定《诗经》韵部为29部，战国时代的韵部为30部。1960年发表的《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韵的分野及其收音》一文，详细讨论了分部的理由，并对音值构拟的一些原则问题进行分析，批评了高本汉等人的失误。文中说：“二十年前，我对于上古汉语的韵母主张二十三部的说法，……前年我讲授汉语史，在拟测上古韵母音值的时候遭到了困难。我不愿意把之幽宵侯鱼支

等部一律拟成闭口音节,那样是违反中国传统音韵学,而且是不合理的;同时我又不能像章炳麟想得那样简单,一律拟成开口音节;假使上古的药觉职德沃屋烛铎陌锡诸韵不收-k尾,它们在中古的-k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讲语音发展不能不讲分化条件,否则就违反了历史语言学的根本原则。”

确定入声韵部独立,还要解决各部的辖字畛域问题。“入声独立成部以后,音韵学家们要处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阴声和入声的分野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具体的字的归类问题。”《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韵的分野及其收音》一文,对于入声韵和阳声韵、入声韵和阴声韵之间互有谐声、押韵的一些字的归部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收-p的字和收-m的字发生关系的,“拿阳入通转来解释谐声现象”;收-t的字跟非入声的字发生关系的,认为中古的一部分去声字在上古本为入声,同时“承认上古的入声有两类(收-t的字有两类)”;收-k的字和其他字发生联系的,就看作互叶,“这里的互叶是指主要元音相同,收音不同。”在谐声字中表现出入声韵和其他韵部互谐时,要区别一般和个别。“关于入声韵部的收字,最普通的标准就是根据谐声偏旁,即声符。段玉裁说过:‘同谐声者必同部。’就一般说,我们的确可以根据这个原则,把声符相同的字归属到同一韵部里。”但是,“‘同谐声者必同部’这一原则也不能机械地拘守。当先秦韵文(特别是《诗经》)和声符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以韵文为标准,不应该以声符为标准,因为造字时代比《诗经》时代至少要早一千年,语音不可能没有变化。”

该文重点讨论的“收音”问题,就是上古汉语韵尾的构拟。王先生说:“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高本汉的上古汉语音韵学,同时捍卫中国的传统音韵学。”文章从汉语的系统性和汉藏语系的类型特征上,论证并批评高本汉等人给阴声韵构拟塞音韵尾的错误。文章指出,把上古阴声韵部都构拟成收-g、-d、-r、-b等浊塞音韵尾的闭口音节,在韵尾辅音是“唯闭音”的汉语里是不可能的,“在汉藏语系中,韵尾-g、-d、-b和-k、-t、-p是不能同时存在的”;这样的构拟使得上古汉语成为完全没有开口音节的系统,“破坏了阴阳入三分的传统学说”,“破坏了‘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的传统学说”,文章的结论是:“高本汉所构拟的清尾和浊尾对立的上古汉语是一种虚构的语言,不是实际上可能存在的语言。”

上古音的脂微质物月五部,在顾炎武的系统里属于一个韵部,后来清

代到民国的古音学家递有离析，到王力先生定为五个韵部。此前的各家在各部的归字问题上多有分歧或失当，王先生《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一文，详细分辨各部的畛域，从系统性上论证脂微分部的合理性，判定两部各自所辖的谐声偏旁；又针对黄侃和高本汉的谐声偏旁归部，订正前人在入声质物和阴声脂微之间划分不当之处；再将质、物两部之间的界限重新厘正。王先生所划定的质部范围比清代学者的“至”部的范围扩大了，物部的范围缩小了。

王力先生批判地吸取了前人的构拟成果，不仅自己构拟了上古声韵系统，并且从理论上提出构拟古音的原则。《先秦古韵拟测问题》一文，就是对科学的古音构拟原则作总结概括。主要的原则是：第一，古音的构拟，应该是音位性质的描写。构拟上古音不同于研究现实语言的语音，它的任务不应该是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去进行物理、生理方面的细微测试和描写，也不可能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区别得细致入微。它所应该做到的，是对一个共时的语音系统进行音位结构的分析并对变化规律作出合理说明。因此，构拟中应该贯彻音位学的方法。王力先生指出：“古音拟测只应该是一种示意图，因此，上古元音只能是音位性质的描写，不应该是实验语音式的描写。”“示意图不是精确的，但也不是随意乱画的，拟音必须做到近似而合理。”如果像某些学者那样，想把两千多年以前人们说话时的细微语音差别都搞得一清二楚，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第二，同一韵部必须构拟相同的主元音。王力先生说：“上古同韵部的字，不管一二三四等，一定要同元音。”对于汉语来说，依照常规押韵的字总是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和韵尾。上古的韵部系统是从押韵材料归纳出来的系统，同一韵部的字必然要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如果给一个韵部构拟出不同的主要元音，那么韵部就变成了韵摄，这不符合汉语的特点。第三，构拟要合乎阴阳对转的规律和韵部之间的远近关系。清代学者所建立的阴阳对转学说，揭示了上古语音的系统性。具体说来，互相对转的阴声、阳声、入声韵部，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并且韵尾的发音部位相同。构拟的结果必须符合这一特点，才谈得上科学性。王力先生说：“在拟测先秦韵部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阴阳入三声的对应关系，凡有对应的阴阳入三声，必须是主要元音相同的。”除了主要元音问题以外，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阴阳入三类韵尾的性质也不容搞乱，阴声韵无韵尾或者收元音韵尾，阳声韵收鼻音韵尾，入声韵收塞音韵尾。第四，构拟的古音系统在类型学上应该符合世界语言的一般性质，更要符合汉藏系语言的一般性质。

构拟古音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上古汉语的真实面目,构拟的结果就要符合于自然语言的一般状态。如果构拟出的系统不像自然语言,也就失去了构拟的意义。高本汉等人构拟的系统有一个大毛病是人为色彩太重,许多地方不合乎自然语言的结构,“如果把先秦古韵一律拟测成为闭音节,那将是一种虚构的语言。”“把上古汉语拟成开口音节极端贫乏或完全没有开口音节的语言,是不合理的。”

在上古汉语的声调问题上,王先生赞成段玉裁“古无去声”的观点,认为中古的去声分别来自上古的人声和平声。王先生提出“长入短入说”,即上古入声原来有长短两种,短入到中古仍然读为入声,长入只存在于收-t、-k韵尾的韵部里,后来丢掉韵尾就变成去声;至于收-p韵尾的则只有短入,没有长入,也就没有变到去声的。《古无去声例证》一文,列举《广韵》的大量去声字,通过《诗经》等先秦诗歌韵文的押韵例证,证明它们在上古或为去声字,或为平上声字。

王先生一向重视总结前代学者的经验,评估各家的得失。他对于清代古音学家,自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到章炳麟、黄侃等,以及近代的高本汉等,都曾有中肯的评论,既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每个人的局限和不足。本文选所收的《黄侃古音学述评》,反映出王先生对学术批评的重视和持论公允的特点。王力先生认为黄侃是清代古音学的殿军。他肯定黄侃的成就,“黄氏最大的贡献是阴阳入三分,入声独立。”“黄氏阴阳入三分比戴氏阴阳入三分更正确。”对于黄侃在古音学研究方法上的错误,王先生有全面的分析。比如批评黄氏以古本韵和古本纽互相证明,“这种循环论证在逻辑上是错误的。”黄侃只承认上古有平入二声,“这实际上等于说上古汉语没有声调的存在。”在分部上,“黄氏拘泥于古本韵的理论,在幽部的入声中找不出古本韵,只好牺牲了这个古韵部(觉部)。”

三、词汇部分

王力先生发表了很多关于古汉语词汇、汉语词汇史方面的文章,《理想的字典》、《新训诂学》、《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同源字论》、《说江河》、《古汉语字典序》是其中重要的几篇。在这几篇文章中,王先生集中阐述了关于古汉语词汇、汉语词汇史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中国语言学的宝贵财富。

王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一再强调,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的意义是受社

会制约的，只有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它才能存在，才能起交际作用。我们解释古人的语言，一定要注意这种解释在当时社会中有没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原则。他认为望文生义、偷换概念等毛病都是忽视语言社会性的结果。他说：“至于望文生义，那是此词本无此义只是从上下文推测他有这个意义，只能在这个地方遇到它，在别的地方再也遇不着它。这就不符合语言的社会性原则，这种解释就是错误的。”王先生又说：“偷换概念是望文生义的自然结果，望文生义的人们不会毫无根据的生出一个意义来，而往往是引经据典，然后暗度陈仓，以达到他们所要生的义。如果重视语言的社会性的原则，偷换概念的毛病就不会产生了。”《孔雀东南飞》“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的“信”字。有人把这个“信”字讲成“媒人”。王先生说：在这句话中似乎是可以讲通了，但在别处没有“信”当“媒人”讲的。这个“信”字是“信使”的意思，也就是“捎信的人”的意思。此处也许可以讲通，而别处都没有这个意思，这就不符合语言社会性的原则。

王先生要求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古汉语词汇。所谓历史主义方法，就是要注意语言的时代性，也就是要注意词汇的历史演变。语言的时代性，也就是语言的社会性在不同时代的表现。早在三四十年代，王先生就明确地提出，“我们研究语义，首先要有历史的观念”。又说，“我们研究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什么时候产生，什么时候死亡”。为了阐明历史观点的意义，1982年王先生特意写了一篇《说江河》的文章，文章中特别声明：“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道理，读古书要有历史观点，要注意语言的时代性，要有发展的观点，要注意古今词义的差别。”王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用历史主义的利剑，拨开纷繁的表象，大气磅礴地说明江河的古义及其发展变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文章中，王先生进一步强调，“为了建立历史观点，在上古书籍中，凡是江河似乎解作专名、通名都讲得通时，都应解作专名”。在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更谆谆告诉我们，“某一个时代，某一个词还没有这种意义，即使这样解释可以讲得通，也不能这样讲”。

王先生强调用历史观点研究词义时，还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

1. 研究词义的发展，要尽力避免远绍的猜测。王先生说：“所谓‘远绍’，是假定某一种语义曾于一二千年前出现过一次，以后的史料毫无所见，直至最近的书籍或现代方言中才再出现。这种神出鬼没的怪现状，语言史上是不会有。”王先生举“该”字为例。《说文》：“该，军中约也。”“应

该”的“该”和“该欠”的“该”似乎都可以勉强说是由“军中药”的意义引申出来的(段玉裁就是这样说)。但可怪的是,“应该”的“该”大约产生在宋代以后,“该欠”的“该”或者更后,而“军中药”的古义,即使曾经存在过,也在汉代以前早成死义,怎能在千年之后忽然引申出两种新兴的意义呢?

2. 研究词义的发展,不能离开语言实际,不能把可能的语义转变看作语义转变的现实。王先生举“回”字为例。《说文》:“回,转也。”“来回”的意义大约在唐代产生,“来回”的意义自然是从“转”的意义引申来的,因为走回头路必须转弯或者向后转。我们只能说当“回”字作“转”讲的时代已经潜伏着转变为“来回”的意义的可能性,我们不能说上古“回”就有了“来回”的意义。

3. 研究词义的发展,要有敏锐的眼光,能发现任何细微的变化而不放过它。王先生说:“段玉裁的眼光最敏锐,譬如他注解‘仅’字,就注意到唐代的‘仅’和清代的‘仅’不同,唐代的‘仅’,是‘庶几’的意义,段氏举杜甫诗‘山城仅百层’为例。唐代的‘仅’和清代的‘仅’都是程度副词,很容易被认为一样,然而前者叹其多,后者叹其少,实际上恰得其反。”

用历史观点研究古汉语词汇,还包括对不同时代的词汇都给予同样的对待。他在《新训诂学》中说:“我们应该把语言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同等的价值,汉以前的古义固然值得重视,千百年后新起的意义,也同样值得研究。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有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王先生又说:“拿历史的观点来看,经义和俗义的价值,无轻重之分。对于每一种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由此王先生明确提出“为史而治小学”的号召。

王先生明确提出词汇也具有系统性。王先生所说的词汇的系统性,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体会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词与词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一个是一个词的若干个意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词、词义联系的总合就构成了词汇的系统。

王先生关于同源词的研究,使我们看清了词与词之间的内在联系。王先生说:“从前人们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同源词就是词汇系统性的表现之一。”

王先生在《同源字论》、《同源字典的性质及其意义》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对同源词的认识。王先生说:“为了编写一部谨严的同源字典,我必须严格地坚持两个原则,(一)同源字必须是双声兼叠韵的;(二)同源字必须有训诂的依据。”王先生彻底抛弃了字形的束缚,从音义两个方面判定

词的同源关系，而且这音一定是先秦古音，因为同源字大多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这义一定有古代训诂的根据，而不是个人的臆测。

词汇系统的另一种表现，是词义的系统性。一个词的若干个意义之间，不是并列的，也不是毫无关系、杂乱无章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清楚的发展脉络，这主要是从本义到引申义的层层演变。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理想的字典》中，王先生就以“朝”字为例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词义发展的系统性。以后的几十年，每讲到词汇研究，王先生必定强调词义的系统。他认为掌握词的本义最为重要，因为词的本义是词义系统的纲，抓住这个纲，纲举目张，纷繁的词义就变得简单而有条理了。

王先生要求语义研究要兼顾语音和语法的研究。早在四十年代，王先生就指出：“语义学并不能不兼顾到它与语音和语法的联系。”

联系语音研究语义，清儒已经注意到，并取得很大的成绩。王先生特别赞赏王念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话，认为这是千古名言。并且说：“整个语言文字的研究，都应依据这个原则。抓到语音就抓到了根本。”

联系语法研究语义，这是王先生的首倡。王先生在《新训诂学》中说：“语法与语义的关系，向来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先生举字典里把“適”注成“往”的错误说：“上古的‘往’字是一个纯粹的内动词，‘往’的目的地是不说出或不能说出的；上古的‘適’字是一个外动词或准外动词（有人称为关系内动词），‘適’的目的地是必须说出的。‘往’等于现代官话的‘去’，‘適’等于现代官话的‘到……去’。这是语法的不同影响到语义的不同。”

词典编纂是词汇学理论与词汇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王先生十分重视词典编纂的工作。他晚年曾说：“编写一部字典，这是我的宿愿。”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词典编纂方面的论文和谈话。如《理想的字典》、《字典问题杂谈》、《古汉语字典序》等，《了一小字典初稿》、《王力古汉语字典》（前四集）则是他词典学思想的实践。

王先生关于词典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主义原则，一个是语义学思想。具体体现在义项的确立与排列以及书证列举。无论是释义还是举例，历史观点是第一重要的指导原则，同时义项的排列要体现词义的系统。

在《理想的字典》中，王先生提出要明字义孳乳，分时代先后。所谓明字义孳乳，就是理清字义引申的脉络；所谓分时代先后，就是要有历史观点，分清字义产生的时代，克服古今字义杂糅的现象。王先生说：“如果把